制图：安宁
版式策划：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玉璞
执行主编：张敬东

2024年
9月10日
星期二

内蒙古日报

北疆文化·文物说

【出圈】阿拉善博物馆一级文物

墨香致远说《通考》

□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杨福丽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文献通考》

长46.5厘米，宽31.2厘米。

纸张每叶四边有粗黑边框，中间对分，每半叶13行，满行25字、26字不等，中缝上下各有“黑口”，内刻书名“文献通考”卷次及页码，下口处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马”“了”“今”等。

《文献通考》的《职官考》部分记载了夏商至南宋历代官职的产生及由来，对历代各类官职按级别、司职情况进行分类，介绍了职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

元代《文献通考》出土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绿城遗址

出土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绿城遗址的国学典籍——元代《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静静地躺在阿拉善博物馆“大漠胡杨　北疆热土——阿拉善通史陈列”展厅的展柜里，这是一部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国学典籍。

1991年的一天，额济纳旗吉日嘎郎图苏木牧民巴图格日勒在绿城遗址附近寻找骆驼时，捡到一册古籍卷册，经文物专家鉴定，是《文献通考》的《职官考》部分，包含《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七的后半部分，以及卷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关于《职官考》的大部分内容，记载了夏商至南宋历代官职的产生及由来，对历代各类官职按级别、司职情况进行分类，介绍了职官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邓文宽先生将《职官考》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对比，得出两者在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完全吻合，应为西湖书院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刻本的结论。

发现《通考》卷册的绿城遗址地处古居延绿洲的西南部，西北距黑城遗址12千米。古居延绿洲是人类活动时间较长、较频繁的区域，自青铜时代至西夏时期，一直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遗存。

西湖书院又名西湖精舍，位于杭州西湖旧府学之地，是元朝的出版中心。元朝十分重视汉文化，推崇儒学，令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设立书院。这些书院纳入官学体系，是正规学校的补充，书院的教职皆由官授，与一般的官学相对应。书院的经费由国家或私人拨捐学田，元代著名史学家黄溍所撰《西湖书院田记》中提到，一位叫朱庆宗的人给西湖书院捐田275亩。

由于经费有保证，所以书院刻书盛极一时。清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赞元代书院刻书之精，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有三个原因：“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元代书院所刻的图书至今仍被各大图书馆视为善本。

出土于绿城遗址的《通考》，宣纸刊印，长46.5厘米，宽31.2厘米，字体为赵体（赵孟頫字体），笔法遒劲，字迹疏朗，十分悦目。纸张每叶四边有粗黑边框，中间对分，每半叶13行，满行25字、26字不等，中缝上下各有“黑口”，内刻书名“文献通考”卷次及页码，下口处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马”“了”“今”等。

《通考》是研究宋史必备的参考文献，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在文献学、制度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马端临是南宋末年右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学识渊博，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是宋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辞职还乡后过了17年隐居生活，勤于读书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马端临。马廷鸾的座右铭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马端临立志要成为专心治学的学者。博学多才的马廷鸾藏书十分丰富，为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端临在《通考·自序》里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通考》以《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扩充门类，增广内容，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伟、物异、舆地、四裔，共24门。《通考》重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把田赋、户口等经济史料放在门类的最前面，以“文献”二字为题，被文献学领域视作“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

牧民巴图格日勒发现《通考》时，以习字纸张做包装，其上有“至正十三年五月”草书字样。以此可见，此卷册最晚在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就已流传到额济纳旗，距离初刻成书已二十余年。从杭州西湖传到西北大漠边缘，不仅反映出《通考》在当时价值之高、流传之广，而且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提供了实物资料。

【自白】

青出于蓝胜于蓝

□高玉璞

中国古代典籍有“三通”，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自三皇五帝到隋，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简称《通考》，以《通典》为蓝本，进行了补充和扩展，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期典章制度沿革。因这三部著作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称为“三通”。

我便是“三通”中的《通考》，主人马端临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是南宋末年的丞相。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主人随辞官的父亲回原籍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居住，便开始为补充《通典》做准备。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动笔，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我装着满肚子货真价实的史料诞生了。从准备到收官，历时49年，主人在我身上可谓倾注了毕生心血，使我成为一部既有详实史料，又有独到见解的史学名著。

我共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主人对《通典》中已有的户口、职役、选举、学校等十九门进行了补充。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主人搜集材料编写的。

我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条目顶格排行的是“叙事”部分，就是所谓的“文”；低一格排行的是“论事”部分，就是所谓的“献”；低两格排行的是主人自己的议论，主人说，“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人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考”。我集文（文献网罗与考订）、献（前人的议论）、注（作者的看法）于一体，这在历史学上是独创。

当代史学家张舜徽先生说：“马端临既就杜氏《通典》补充其内容之所未备，分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并且把它向前发展了，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文献通考》中。”

主人在为我写的《自序》中表示，详尽分析了蓝本《通典》，取其得，补其失，终于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观点】

南书北运话交融

□吴婷婷

古籍文献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它们是浓缩着一个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珍贵记忆，是中华博大恢宏文化史的生动证明。阿拉善博物馆藏元代《文献通考》卷册散页，经考证为西湖书院初刻本，于公元1324年刻成，是现存该书最早版本，也是元代书院刻书代表作。

专家认为，《文献通考》有三个显著特点：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从内容而言为《通典》的扩展与延续；对蓝本《通典》里中唐前的基础内容做了补充，中唐以后是作者广收博采的结果，尤以宋代部分史料最为丰富，典章制度中刑考分为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参考；《通典》把国家经济放在首位，《通考》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为8门之多，更表明作者对国家经济的重视。

《通考》自元代刊印以来，历代多次刊刻。明以后刊本众多，较为著名的有明正德十一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本、明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明嘉靖冯天驭刻本，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同治崇仁谢氏刻本等。这些版本不仅展示了《通考》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力和流行程度，也反映了该著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通考》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字雕版印刷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阿拉善博物馆珍藏的《通考》卷册散页被发现时，以习字纸张做包装，纸上写有“至正十三年五月”字样。由此推断，此卷册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就已从西湖书院流传到地处偏远的亦集乃路（辖境在今额济纳旗），足以说明《文献通考》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南书北运，更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阿拉善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历史深处的明珠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书院如璀璨星辰般闪耀，凝聚着古人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千年文化传承。元代杭州西湖书院与中国其他古代书院不同，这座书院以整修书版、校书、刻书为主业。虽然古代的书院大多都附带有藏书与刻书的功能，但像西湖书院以此名于世者，却仅此一家。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评价：“生产图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一种职能，自唐代丽正、集贤书院的‘刊缉古今之经籍’，到五代、北宋时期由修书到刻书的过渡，到南宋‘书院本’的赫然面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书院的这种职能不断强化，到元代终于分立出近乎专门从事出版事业的书院，出现刻书专业的倾向。其时，具有这种专业倾向的书院不在少数，最具典型意义的则是杭州西湖书院。”

杭州西湖书院渊源可追溯至南宋。宋代，书籍已经由写本时代发展到刻本时代，赵构把宋朝的国都迁到杭州，在岳飞的府第建了当时朝廷的最高学府——太学，把分藏于各地方的书版汇集到了这里。后来，宋朝落幕，宋国子监及其学与社俱废，只留下了礼殿。幸运的是太学当时所存放的书版得以保存，为后来西湖书院的发展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代官员、文学家，“东平四杰”之一徐琰挂牌创建西湖书院，开启了教学与刻书事业，西湖书院成为文化传承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泰定时期，书院迎来大规模刻书的辉煌阶段，整理出了包括《文献通考》《国朝文类》等在内的122种图书。其中《国朝文类》是皇帝亲旨刊刻，由此可见西湖书院当时的地位。

书院经费有官方拨款和私人捐助。根据资料记载，西湖书院创建初期“有义田，岁入其租，以供二丁祭享及书刻之用”，而后书院的义田面积越来越大，最多时有1923亩。

元末，杭州城陷入战火，西湖书院受到重创。明初虽有短暂恢复，但最终还是隐退历史舞台。

2023年7月15日，西湖书院重新挂牌迎来新生，宛若一位见证时代变迁的智者，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雷焕　供稿）

（本版支持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